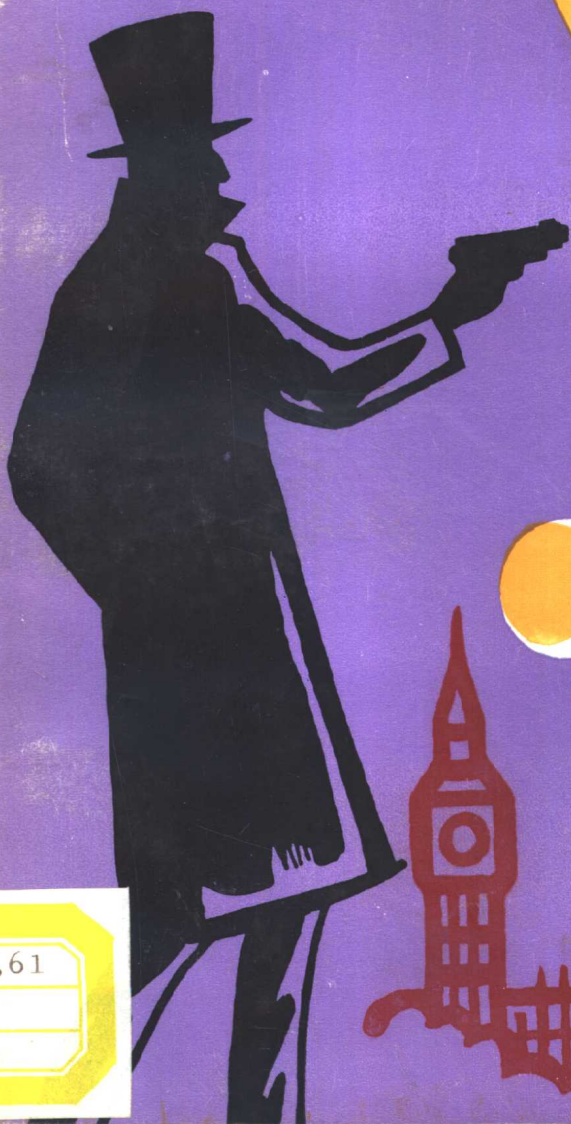


英国

著名间谍传



[英]理查德·狄肯著
韩 静 付 兮译

5.61

英国著名间谍传

[英] 理查德·狄肯著

韩 静 付 兮 译



Richard Deacon
A HISTORY OF BRITISH SECRET SERVICE

根据伦敦 Panther Books 1980年版译出

英国著名间谍传

〔英〕理查德·狄肯 著

韩 静 付 兮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8插页 143 000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75—2/I·69

统一书号: 10107·563 定价: 1.35元

印数: 1—20 200



丹尼尔·笛福

（见第二章）



约翰·瑟罗

（见第一章）



理查德·柏顿

（见第四章）



双料特工人员席德尼·瑞利

（见第四章）



雷金纳德·霍尔

(见第五章)



弗农·凯尔

(见第六章)



贝西尔·托马斯

(见第五章)



克拉斯蒂娜·格兰维尔(女)

(见第十三章)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通过研究大量的史料，以不同时代的著名间谍为线索，详尽地记叙了英国16世纪到现代的间谍人物、间谍活动和间谍机构的产生及其对历代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尤其近代和现代占较大篇幅。许多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人物也参加了间谍活动，读来使人不胜惊讶。

全书材料剪裁得体，故事性强，是了解英国以及与其有关国家间谍机构内幕的一份不可多得的材料，因而在世界许多国家一版再版。本书是根据英国美洲豹出版公司第25次扩充新版翻译的。

1/123-2

目 录

作者的话	1
前言	3
1 约翰·瑟罗：克伦威尔的间谍大王	12
2 丹尼尔·笛福	20
3 威灵顿的谍报机构	30
4 在美国的双料特工人员托马斯·比琪和“三 大怪杰”	38
5 强有力的三位一体：卡明、托马斯和“眨巴 眼”霍尔	68
6 “第五军事情报局”的缔造者：弗农·凯尔	84
7 非凡的特工人员左哈洛夫	97
8 瑞利的最后一次投机	113
9 大卫·皮特里爵士的重任	132
10 神秘主义与间谍活动：海斯行动侧记	145
11 “露西”集团	159
12 利用黑手党与戈纳司上将之谜	174
1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女性立下的赫赫战功	189
14 上层机构中的出卖行为	196

作 者 的 话

这本书是《英国间谍机构史》的最新版本。第1版于1969年出版发行。然而纯粹因为很多事实真相不为历史学家知晓的缘故，也许可以明智地说没有任何一部间谍机构史能够完全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一情况更符合英国的间谍机构史，不仅因为历史学家受到所谓的审阅国家档案的“三十年条例”的限制，而且还因为国家文职人员（有时是政治家）将那些他们希望彻底禁止公众审查的文件和文献销毁，从而阻止了历史学家了解内幕实情。

尽管如此，获得情报的渠道正在逐渐扩大，而且那些权威人士也不再象10年前那样激烈地反对透露消息。在《英国间谍机构史》的第1版发行之前，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曾要求看这本书的打字稿，他的要求被婉言拒绝了，而仅仅是在这本书正式出版之后提前赠送了他一本。当然如今不会再有人提出类似专横且实在不合适的要求来。我并没有打算背叛我们国家的利益，或者披露任何有损于这些利益的事情。因此我急切地期待着这种对丑闻共守同盟，保持沉默以及暗地里设置障碍的行为尽早结束，因为这不仅对国家绝无任何益处，而且在过去一直给背叛者们可乘之机，使他们肆意横行，并将种种严重错误掩盖起来。

这本书里所讲述的最新动态本身就极其令人兴奋。首先

本书包含了前10年内所发生的事件；其次，还同时具备这一时期的文件和档案，可供审阅。然而最有趣的特点也许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此书最早版本的世界各地的读者们提供的大量新信息（此书除在英国出版之外，还在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出版发行）。这些新信息是通过信件或私人间的往来获得的。

读者们有时建议补上第1版中漏掉的某个间谍。我对那些提议我写上一位当受国葬待遇的安德烈少校这个间谍的人们表示深深地感谢。我这样做了。事实上，我不仅努力跟上这过去的10年，而且试图改进前400年的记述。

我常常受到朋友们的奚落，他们认为给间谍活动的评价过高了，“其实这不都是毫无必要的游戏吗？”我不反对有的时候这种活动是幼稚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活动却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机智地运用“双线交叉体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住了纳粹进犯不列颠岛屿的企图？或者——这是本书中记述的令人惊讶的新故事之一——如果斯蒂芬·艾雷少校作为英国特务头子执行命令，杀害了斯大林，那么俄国又会是怎样的呢？

或者，就此事来讲，今后10年内所发生的一切将以何种方式暴露出来而持续不断地改写历史呢？

前 言

写任何一部间谍机构史都必须同许多假想的敌人作斗争。

这些假想敌人当中不小的一位便是正统历史学家对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间谍活动这个题目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同既不明智又不符合逻辑地将特务机关的活动同一个民族历史的进程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密切相关。然而毋庸置疑，间谍活动确实取得了一些辉煌又常常不被歌颂的胜利。

自称为研究间谍机构史的历史学家所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当他越靠近当今时代，他的工作就变得越加困难，而相去甚远的过去在文献中都有合理恰当的记载。离现在越近，事实真象越是被精明地掩盖起来，而且不可避免地越是有危险触到法律及国家机密条例的暗礁，更不用说触犯诽谤罪法令的危险性。过于深入地触及这方面的问题，将自己卷入谍报活动中，以及引用为国家机密条例所禁止的文献等，这一切不仅仅造成一种不利的条件，而且经常为这项工作的进行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要举例说明这些所要冒的危险，我最好还是摘引 M. R. D. 福特著的《英国特别活动委员会1940——1944年在法国的活动》一节，福特先生在他的前言中写道：

“我当然试图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做出尽可能完善、尽可

能精确、尽可能持平的记述。如果仍然存有不当之处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比我本人对此感到更吃惊，因为就此题目已经发表了的文章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而那些还没有发表的成果则经常是自相矛盾、混乱不堪的。”

还有一个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需要对付的假想敌人就是偏见。首先是自身的偏见，其次还有外来的偏见。这本书至少意在避免由于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而产生的偏见。简言之，这本记述史实的书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极力抵制官方的阻碍、限制及禁令。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一本官方史书，因此也不需要受到任何形式的审查。

然而既采取了前段中所提出的态度，那么作者本人的偏见便受到孤立。除事实本身外，不存在任何限制性的影响。有时候一组事实可能会否定另一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得不通过分析来自己完成侦破工作。

我以为文献及历史事实都表明英国间谍机构在力量上和效益上要比其他国家的间谍组织浮动的程度大。在某些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一些时期则出现一连串的、令人沮丧的失败。有那么几十年因在间谍活动上花费的财力太少而不可能获得什么效益，还有一些时候则拨给间谍机构大量的资金，从而引起了组织形式上及方法上突破性的、令人欣慰的转变。

一般说来，间谍机构的成败与所花费资金的数目、当权人物的能力以及当时政府对此所持的态度等有直接的关系。

一个缺乏强有力的间谍机构的强国注定要走向灭亡：这类的教训从特洛伊的全盛时期至今比比皆是。而拥有一个强

有力的谍报组织，不管它的开销有多大，对小国、中立国及大国都是同等的重要。瑞士之所以能保持中立立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拥有一个不带侵略性然而却十分有力的反间谍活动机构。以色列则为小国树立了一个典范，它不仅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且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间谍组织所提供的情报而取得了持续了六天的战争的胜利。

首先有一点必须讲清楚：使用“英国间谍机构”这一不够严谨的词，我并非指具体哪一个国家谍报机关，而是包括英国谍报机构的所有组织部门——有“秘密谍报机构”、“第五军事情报局”、“第六军事情报局”、“海陆军谍报部”，以及其他较为鲜知的机构。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个单独的谍报机构只能做出歪曲的描述。在谍报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有时是这一个组织，有时又是另一个机构。然而更经常的是些临时性的机构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特别行动委员会”以及经济竞争部所属的谍报部门等。

正如《在乳白色的树林下》一书中的叙事者急于开始他的故事时所说的：

“从开头开始，可以确定英国国家谍报机构的起始点，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也包括传奇在内，都表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的间谍组织同人类的存在一样古老。我们可以举出诺亚，当他放出鸽子去观察大水是否退去时，实际上就进行了第一次为人所知的空中侦察形式的尝试。伦敦检查厅别动队的缔造者贝西尔·托马斯爵士曾经说过：‘如果麦姆波塔法老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谍报组织，那么就不会发生大批以色列人被逐出埃及的事了。’”

在欧洲国家里，间谍组织是通过聘用大使和使节充当间谍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外交与行窃几乎成了同义词。但是在中世纪，这种形式的间谍活动主要是用来对抗英国，而英国派往海外的大使们几乎没有使用过这一手段。事实上，在1293—1298英法战争期间，有一位名叫托马斯·特伯维勒爵士的英国骑士，其实是受雇于法国国王菲利浦四世的间谍。特伯维勒被派回不列颠进行煽动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起来反对爱德华一世的活动。这种单方面的间谍活动持续了好几年之后才逐渐摆脱掉他们狭隘的保守性，开始认识到派一些使节为他们提供有关外国政策及错综复杂局面的情报的重要性。现代外交诞生于威尼斯。早在1268年从威尼斯派出去的大使们就必须在他们回家后的15天之内递交有关他们任职情况的报告，并对政府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解答。

威尼斯大使的活动促进了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的初次反间谍活动。亨利七世认识到清楚地了解他的敌人的动向对他至为重要的。他同时在国内、国外雇用了一批特工人员去刺探渥贝克和萨福克的阴谋活动的情报，但是这批人决不是一支有组织的治安防卫力量。亨利七世的统治为最拖拉、最无效益的国家间谍机构开了一个不利的先例。

但是在紧接下来的统治时期里，事态又有了一些进展，甚至取得了一两次颇为显著的反间谍活动的胜利。1515年威尼斯驻英国大使吉斯丁尼安尼发现他的信件被英国政府官员拆封，他向沃尔塞红衣主教提出强烈抗议，并向威尼斯的主要行政官员作了汇报：

“由陛下您写给我的信，在信使到达坎特伯雷时，被皇族官员强行取走，并拆封读了这些信件。从最显贵的驻法国大使巴德欧那里来的信件以及来自其他人的私人信件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干涉外交官的通讯联系在欧洲是一种极为普遍的行为。这就迫使许多国家使用暗号和密码。在这件事情上，威尼斯人又一次显示出他们高超的技巧。直到1868年两名学者才最终破译了玛丽一世统治时期威尼斯驻英国大使米歇尔使用过的密码。

然而不列颠国家间谍机构的发展主要依赖于都铎王朝的统治。当亨利七世被还未登基的理查德三世从一个地方驱逐到另一个地方时，他就亲身体验到私人间谍组织的重要性。多亏了他的特工人员的警觉，才使得他挫败了理查德三世企图在布里特尼绑架他的阴谋。在这次事件中，他能幸免于难全仗着克里斯朵夫·俄罗斯维克，此人后来当了伦敦的首席法官。但是亨利七世的间谍组织的性质主要是属私人而非国家性。他的儿子，亨利八世，对自身的安全问题不那么谨慎，还将所有有关间谍组织的问题一并交给他的国务大臣们负责，先是交给渥尔塞，后来又交给托马斯·克伦威尔。然而，相对来讲，渥尔塞对他的主子还是很效忠的，但他在他的间谍机构中疏忽一个辅助性目标——即没有使他自己当选为教皇。

托马斯·克伦威尔野心勃勃，具有更坚强的性格。他以毫不留情的工作效率接管了间谍机构的整修工作，试图使其协调发展。他增加了特工人员的数目，在英国境内建立了一

个有组织的恐怖集团。跟典型的都铎早期统治时期的情形一样，这时所进行的更主要的是反间谍活动，而不是在国外进行积极的间谍活动，因为亨利八世的政策是使英国在辉煌中闭关自守，对国外的谍报机构至多是有点兴趣，更严重点儿就是完全的漠不关心。克伦威尔建立集团的目的就在于迫害所有心怀不满的英国人，并以审讯或屠杀的方式根除他们，到时就看哪种方式更方便些。克伦威尔眼下要对付的是西班牙大使切浦斯施的种种阴谋诡计，这个人当时正疯狂地企图推翻英国政府在北部、西部和威尔士的统治，若不是有克伦威尔在，他肯定也会在伦敦获得成功。在审讯托马斯·莫尔爵士的过程中，瑞琪所做的伪证足以表明克伦威尔是如何利用他的特工人员轻而易举地改变了正义的航道。

然而英国仍然缺乏一个专门从事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谍报机构。克伦威尔的间谍机构经常是为其主要目的服务的附属品。由他组织的持续了九个月之久的巡视修道院活动提供给他的秘密情报大大地超过了打算并收、接管直至废除修道院所需的情报的数量。克伦威尔手下一名相当勤勉的特工人员，白金汉宫的副主教理查德·雷顿博士在1535年10月给他的信中写道：

“在北部既没有修道院、附属修道院、小修道院，也没有其他宗教性质的建筑，而我同利博士对这方圆十一二里都非常熟悉，所以没有什么不法行为能瞒得过我们。”

当然，克伦威尔对修道院的巡视与其说是体面的调查，不如说是政治迫害。直到1533年克伦威尔才开始认真地考虑

在外国土地上进行间谍活动，而即使到了这时候顶多也只是为获取情报而采取秘密行动。他的用意是回避他的皇家主子的漠然态度，在欧洲大陆为英国寻求联合体。他决定调查德国的情况。他派遣了两名特工人员去德国旅行，向他报告那里的政治和宗教活动情况。其中一位是他的朋友斯蒂芬·凡高。然而此行获益甚微，路德宗教派的诸侯们对同亨利八世搞联合没有多少兴趣。

克伦威尔具备一个理想的谍报机构领导人的很多品质。他不仅处处有条不紊，讲求效益，而且他坚信通过及时地采取行动，不留下任何可乘之机能够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危机。他还主张制定长远计划。他的这些政策在国内大显身手，但在国际事务中的实施却导致了克伦威尔本人的灭亡。他的优点在这里变成了他的致命弱点。狄更斯教授在他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一书中写道：

“不论名声有多么恶劣，无能的君主常常有益于英国，因为欧洲的形势变化之快以致使任何没有长远性的投机政策都成为最明智的政策。从都铎王朝盛衰无常的外交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机会主义同教条主义之间的对立。象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总能不受损伤，而那些所谓的制定方针的机会主义者，象渥尔斯、玛丽·都铎等，却以一片混乱而告结束。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都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但克伦威尔却多少有些接近教条主义者。”

处在机会主义同教条主义冲突之中，一般来讲特别是当机会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占了上风时，谍报机构必定遭难。亨利七世处在有些涣散的时尚中，第一次试图通过建立一套

特务机构来保卫他的皇位。伦敦的首席法官克里斯朵夫·俄斯维克是他的主要特工人员，而他作为间谍机构的领导人比作为君主的私人侦探所起的作用更大。但是这个人靠着他的执拗，他的爱国主义，他的才识和豁达创建了一个组织，从而为他赢得了英国间谍机构创始人的称号。

多少年来这个机构在历次重大危机中及战时都为报效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有些时候，如在小型战争中和平时时期，它却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它的主要战绩大都在爱尔兰取得，400年来，它在那里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个间谍机构的爱尔兰分部总是保持戒备状态，倒不仅仅是爱尔兰反叛者的缘故，而是因为好几个别国，如法国、西班牙和美国等都在利用爱尔兰玩弄阴谋诡计，挑起事端。然而就在19世纪的最后三年里，爱尔兰的间谍机构遭到瓦解、渗透，直至名存实亡。

有时候间谍机构的活动受到外交部的阻碍，有的时候它提出的警告不为当时的政府所重视。最近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内维尔·张伯伦任总理大臣期间。

很显然，任何一部间谍机构史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即使能得到所有有关的文献及档案加以审阅，其中也还会存在不准确之处、夸大失真的报告，以及解释得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材料时所需解决的问题。深入细致地研究长达450年之久的间谍机构史之后所能得出的只能是一幅间谍与反间谍活动的发展过程、变化形式和反适应于英国的不变的性质及趋势的画卷，而不可能对间谍机构的领导人、个别的特工人员的机警、勇气和成功作十分详细的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的间谍机构中个人所起的作用远